

# 《庄子》会话语篇语用修辞方式探微

大连理工大学 陈海庆 姚微微

**摘要:**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语用学理论与修辞学中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结合起来,以庄子的会话语篇为语料,从语用修辞行为、语用修辞意图和语用修辞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庄子语篇中会话的特点,通过实证研究说明语用修辞研究方法适用于庄子会话语篇的可行性。

**关键词:** 语用修辞行为;语用修辞意图;语用修辞效果;《庄子》

**作者简介:** 陈海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语篇分析、文体学研究。电子邮箱:chenhaiqing789@163.com 姚微微,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用学、语篇分析研究。电子邮箱:yaoweivei1113@163.com

## 1 引言

《庄子》是我国一部重要的古典名著,其哲学思想、艺术魅力、文学价值和语言运用技巧在中国典籍作品中独树一帜,各领域的学者专家不断挖掘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汉语言文字的深刻含意。迄今为止,研究《庄子》的文献数不胜数,虽然有的学者(陈启庆,2010)从修辞学角度对《庄子》进行过探讨,但从《庄子》的微观结构入手,以语用学修辞理论为指导探讨其人物之间的会话过程及其言语行为意义并不多见。

谈到修辞学,我们自然会想到西方修辞学和国内修辞学,二者研究的历史和过程却不尽相同;而语用学则是一门从西方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语言研究学科,二者看似各司其职,但归根结底都是研究语言如何使用的学科。起初二者都是在雄辩术的名义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今虽然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但两者都关注言语意义和语境,有着相同的语言学发展背景。中国古代修辞学一直以来偏重于言语表达的研究,而对言语理解和接受的关注较少。语用学尽管既研究表达也研究接受,但总体来说侧重话语理解和推理机制的探索。近年来许多修辞学研究者都主张加强对修辞接受的研究(谭学纯,1992),使修辞学逐渐迈出了重视修辞接受

与理解的重要一步。从语用学角度来看,接受修辞学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有殊途同归之功效。我们要发展传统的修辞学理论,就必须吸收和借鉴语用学理论来拓宽修辞学的研究思路,其中,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含义理论对于丰富修辞学的研究内容,拓展修辞学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文试将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含义理论与修辞学理论相结合,对《庄子》的会话语篇微观结构和会话功能进行初步探讨。其研究特点是:在研究内容方面,着重从语用修辞行为、语用修辞意图和语用修辞效果上进行分析;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庄子》会话语篇的实证研究,以《庄子》文章中的典型对话为例进行探讨。

## 2 语用修辞

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西方修辞学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中国修辞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对来说,语用学发展历史比较短,它最初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直到1977年荷兰发行《语用学学刊》,语用学才被确立相应的研究地位。尽管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自语用学诞生之日起修辞学家就开始探寻两者的密切关系。语用修辞至今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说法,因此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定义。近年来,由于学科研究趋向多元化,交叉学科层出不穷,学者们不断探索相似学科的结合点。在这个大背景下,语用学和修辞学也逐渐走入语言学家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两者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相结合的可能性。许多学者提出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

早期何自然教授(2000: 38—44)已开始关注二者的密切联系,并就它们的发展历史、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以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最后提出了语用学对修辞学研究的启示。他认为,修辞学可以借鉴语用学对语用效果的追求来研究表达和接受效果统一的修辞效果。另外在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上也可借鉴语用学,进行控效研究和取效研究,从话语接受者而非表达者的角度去研究修辞;另一方面可以把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相结合,运用语用学中的顺应论来动态地研究修辞方式。张会森(2000)认为,语用学和修辞学都把言语交际作为研究内容,并且都关注交际手段的选择和言语效果问题。语用学和修辞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就是建立语用修辞学,即“吸收语用学的长处弥补修辞学的缺陷,使修辞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刘大为(2003: 1—5)从言语学、修辞学、语用学三个术语的分析出发,论证了它们在语言运用研究上殊途同归的学科性质。李军(2005: 69)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们就是借鉴语用学研究成果,丰富修辞学的研究内容”。戴仲平(2007)也提出了相同观点,即“语用修辞学就是要借鉴语用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尝试建立具有较新理论体系的修辞学”。黎运汉(2002)认为,可以建立汉语语用修辞学,既可以借鉴语用学的理论也有助于提高人们运用语言的能力。英国语言学家G. N.利奇(G. N. Leech, 1983: 16—17)提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他认为语用学是以修辞语用为特征的,而修辞学是以语用修辞为特征的;他指出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其相关理论和观点也为学界所认同。由上述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所谓语用修辞,就是把语用学理论与修辞学理论和修辞方法结合起来,描写或阐释具体语境中发话人的语用修辞行为、语用修辞意图和语用修辞效果。

传统修辞注重表达,认为修辞行为是“选择表达方式,追求表达效果的行为”(马睿颖、林大津,2008: 66—72)。对于修辞的研究多集中于修辞格的扩展和丰富,探讨的是艺术化的语言。可以说修辞学研究的是“表达技巧”,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言语行为”,语用修辞就是把修辞也看作一种言语行为,是带有某种语用修辞意图和追求语用修辞效果的言语行为。语用修辞不只关注表达者如何表达语言,而且关注接受者如何理解表达者的意图,主要指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而不仅是句子本身所传达的意思。传统修辞把修辞看作单方面的活动,而语用修辞更加强调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互动,研究的是整个交际的过程。传统修辞把修辞看作是一种静态(static)的修辞现象,而语用修辞则将修辞活动看作是动态(dynamic)的,注重修辞过程中语境的作用及话语的顺应。

### 3 庄子与《庄子》语篇研究

庄子是我国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道家学说及思想的主要创始人,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老庄”。庄子早期做过漆园吏,后来多次放弃了入世机会,以编织草鞋为生,一生虽穷顿困苦,但却活得逍遥自在。《庄子》是其代表作品,分为内、外、杂篇;原有五十二篇,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思想的核心是“道”,主张“以道为本”,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他又阐明了多种思想,如“万物齐一”、“自然无为”、“逍遥而游”。为了体现这些思想,庄子在语言的雕琢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尽管他一直强调道不可言,但他又无处不在用言论道。语言的形式是其思想的外壳,任何思想都要通过这一形式来传递,没有了语言的形式,其思想也便无可依存。因此,在《庄子》的语篇中,他运用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正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的文章中用了很多的寓言故事,在他的笔下,虚构了很多不同的形象,其

中有人物,有动物,也有植物,甚至还有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例如罔两、景、云将、鸿蒙等。

历来有很多学者对《庄子》一书进行研究,他们或从哲学角度探索其深邃的思想,或从文学角度挖掘其艺术魅力,或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其构词组句的篇构技巧,或从美学角度探究其词藻的华丽。此外,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各个语篇中修辞的运用,尝试将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应用到庄子语篇的研究中。我们采用输入主题词“庄子”及“哲学/文学/美学/语言学/修辞学/语用学”的调查方法,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2年1月至2012年11月期间有关庄子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检索。统计结果显示:对《庄子》研究集中于哲学方面的占53.5%,占据首位;其次是对《庄子》文学和美学的研究,分别占到了22.8%和22%;再次是对《庄子》语言学的研究,占1.4%。在对《庄子》语言学的研究中,修辞研究有二十篇,语用研究仅有三篇。对于《庄子》的修辞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庄子》修辞方法的研究,即研究其某一种修辞方式及其修辞效果的产生;二是把修辞和哲学结合起来,对《庄子》的表达和接受修辞策略进行研究。比较而言,对《庄子》会话语篇的语用研究也为数不多。从目前检索统计的资料来看,从语用修辞角度对《庄子》进行分析或研究的文献几乎为零。为此本文尝试把语用学理论和修辞手段结合起来,探讨语用修辞方法在《庄子》会话语篇中的具体应用和修辞效果。

#### 4 语用修辞的言语行为特征

黎运汉(2002)指出,“修辞学应该借鉴引进言语行为理论,探讨以人为核心内容的言语行为的修辞”。这一观点表明,以言语行为为出发点可以有效地把语用学和修辞学结合起来。言语行为(Levinson, 1983: 236)包括三个层面,即“locutionary act”(言内行为)、“il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和“perlocutionary act”(言后行为),这与修辞过程中的修辞行为(rhetoric act)、修辞目的(rhetoric purpose)和修辞效果(rhetoric effect)不谋而合。因此从修辞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言语交际行为划分为语用修辞行为、语用修辞意图和语用修辞效果三个层面。

语用修辞行为:在修辞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把修辞看作是一种行为。其中,国外学者詹姆斯等人(L. B. James & W. Colemon, 1989: 2)提出的修辞交际观和豪泽(G. A. Hauser, 1986: 72)提出的行为修辞观。国内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胡范铸(2003)指出:“所谓言语行为就是用语言实施语用意图的行为,任何修辞都是人的一种行为,任何修辞行为都是语言运用行为,任何语言运用行为也都是修辞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试图有效实现自己目的的言语行为都是修辞行为”

(张大毛, 2008)。言语行为与修辞行为是统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话语交际中的语用修辞行为既包含了言语行为的特性也涵盖了修辞过程中的修辞技巧。其不同点在于,言语行为研究注重话语理解,而修辞行为研究侧重话语表达;语用修辞行为把话语理解和表达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交际双方的话语行为。

**语用修辞意图:**任何话语交际都是以实现一定的话语意图为前提的,无论是语用学中的间接言语行为还是修辞学中的积极修辞,话语策略都是为更好地传递话语意图服务的。刘焕辉曾经指出,在言语交际的修辞过程中,言语交际双方最关心的就是话语内容所包含的说话者意图,这既包括说话者有效传达的话语意图,也包括接受者理解了说话者的意图并做出相应的反应(1989)。我们应当把修辞看作是言语行为,首先是从对这一行为的认识出发,分析某一言语行为如何能够实现其交际意图(胡范铸, 2003)。所谓语用修辞意图是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交际意图,换言之,是说话人如何传递的意图与听话人如何做出反应的意图。

**语用修辞效果:**王希杰(1993: 39)认为,“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来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模式的一门语言科学”。可以说,修辞学归根结底是一门注重表达效果的学问。随着近年来对接受修辞学的研究不断深入,对接受修辞效果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从谭学纯等(1992: 118)开创了接受修辞学研究以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对表达和接受的双向研究。因此,“讲究修辞就是要用最经济的语言材料,传递尽可能大的信息量,达到尽可能高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张志公, 1985: 1)。譬如,在研究言外行为的言外之意与言后行为的修辞效果方面,我们要把言语交际的效果分为“社交性成功”和“认知性成功”两个层面,前者指的是“表达者使接受者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即产生了表达者预期的修辞效果”,后者指的是“接受者推断出表达者的语用意图”(林大津、毛浩然, 2006)。概而言之,语用修辞效果就是把语用效果和修辞效果结合起来,既研究接受者理解了说话人的意图,也研究接受者是否按说话人意图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情感反应、行为反应等。

## 5 《庄子》会话结构及其修辞策略

《庄子》语篇多采用会话的形式传递其哲学思想和观点,“藉外论之”是其会话的最大特点之一,看似不合逻辑、不合常规的思维是其语篇的一个明显特征。无论是会话结构还是会话策略,庄子之文都显得与众不同,让读者既困惑不解又叹为观止。

## 5.1 会话结构

《庄子》与《孟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章最大的不同在于庄子构思并设计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对话,其会话结构并非按照一问一答这样的相邻对子(adjacency pairs)出现的,而是呈现出答非所问、以答引问、以问答问、问而不答的会话结构特征。《庄子》语篇中的会话涉及各式各样的人或物,会话的发起者一般是由和庄子持相反观点的人或物来代言,而听话人一般是庄子本人或其代言人(或物)。会话主要分为问答和辩论两种形式,在问答式对话中,往往是庄子或其代言人解答问话人的疑惑,并阐明他自己的思想或观点;在辩论式对话中多是由庄子本人或庄子的代言人劝导或说服发话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解决途径。

## 5.2 会话策略

《庄子》一书主要采用了寓言、重言、卮言相结合的描述方式,借他人之说来阐述庄子本人的观点,即通过重复之言来反复申述庄子的思想,通过“漫衍”的文章结构和“始卒若环”的篇章布局来传递“道即言,言即道”的思想(陈启庆,2010:24)。在《庄子》会话语篇中,庄子运用了大量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手法来突出人或物性格,阐明“道”无时不存、无处不在的思想。所谓积极修辞,就是在说得清楚的前提下如何能够更打动人,产生更好的修辞效果,譬如,运用比喻、排比、对比、拟人、对偶、夸张等取得修辞效果。所谓消极修辞,就是要把话说得清楚明白、不含糊,在内容方面要求明确通顺,在形式上要求平匀、稳密即可(陈望道,2005)。在《庄子》会话语篇中,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完美结合使得庄子的哲学思想及其创得意境更加真切、自然、生动和清晰,在确保正确传达其思想的前提下使人更加容易与之产生共鸣,发人深省。

## 6 《庄子》话语实例分析

为了对《庄子》语篇中的会话特点及其语用修辞方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按照庄子本人所倡导的哲学思想,即“万物齐一”、“逍遥而游”和“自然无为”选取了三组比较有代表性的会话,以期通过实例分析来探讨《庄子》会话语篇中语用修辞的功能和效果。

## 6.1 “万物齐一”的思想

《齐物论》历来被学者们看作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一篇。它主要阐述了齐是非、齐万物、齐物我的思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其所有思想的最高境界。在庄子的其他篇章如《大宗师》《应帝王》《至乐》《在宥》《徐无鬼》《知北游》《庚桑楚》《则阳》中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故选取此篇中的一段加以分析。

例(1):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曰:“吾恶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

“然则物无知邪?”

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歛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恟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荇,虻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犹狙以为雌,麋与鹿交,歛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

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译文:啮缺问王倪:“你知道各种事物相互间总有共同的地方吗?”

王倪说:“我怎么知道呢!”

啮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

王倪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

啮缺接着又问:“那么各种事物便都无法知道了吗?”

王倪回答:“我怎么知道呢!虽然这样,我还是试着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还是先问一问你: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部患病甚至酿成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住在高高的树木上就会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究竟谁最懂得居处的标

准呢?人以牲畜的肉为食物,麋鹿食草芥,蜈蚣嗜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则爱吃老鼠,人、麋鹿、蜈蚣、猫头鹰和乌鸦这四类动物究竟谁才懂得真正的美味?猿猴把狙当作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毛嫱和丽姬,是人们称道的美人了,可是鱼儿见了她们深深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她们高高飞向天空,麋鹿见了她们撒开四蹄飞快地逃离。人、鱼、鸟和麋鹿四者究竟谁才懂得天下真正的美色呢?以我来看,仁与义的端绪,是与非的途径,都纷杂错乱,我怎么能知晓它们之间的分别!”

啮缺说:“你不了解利与害,道德修养高尚的圣人难道也不知晓利与害吗?”

王倪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圣人实在是神妙不测啊!林泽焚烧不能使他感到热,黄河、汉水封冻了不能使他感到冷,迅疾的雷霆劈山破岩、狂风翻江倒海不能使他感到震惊。假如这样,便可驾驭云气,骑乘日月,在四海之外遨游,死和生对于他自身都没有变化,何况利与害这些微不足道的端绪呢!”

这段对话是在学生啮缺和老师王倪(两人是传说中尧时贤人)之间展开的,主要讨论判断事物的标准。“知”与“不知”是他们会话的核心,在这简短的对话中“知”字共出现了16次。它所阐明的观点是,万物是平等的,没有优劣对错之分,不能用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衡量其他事物的是非曲直。

首先,从语用修辞行为层面看,在会话的开端,发话人啮缺接连向受话人王倪提出三个问题,即是否知物之所同,知子之所不知,物无知。这里用了一连串表示疑问的直接言语行为句,层层递进向受话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通过运用消极修辞手法明确了话题的主旨,其目的是提出话题,引导受话人作答。但受话人王倪一问三不知,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法拒绝回答啮缺的问题,然后又“尝试言之”,但他没有直接告诉啮缺问题的答案,而是把表述和指令的言语行为通过一系列的反问、排比、对偶、对比、夸张的修辞方法反映出来,用了陈述和疑问的言语行为传达了批评的言外之力,否定不同主体存在共同的价值标准。这里王倪违反了质量准则(quality maxim),因为从后面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同时,王倪也违反了数量准则(quantity maxim),因为他没有正面回答啮缺的问题,而是用人鱼鸟兽做比喻来反问发话者。显然,王倪所提供的信息量多于啮缺所需要的,这主要是为了批评啮缺没有区分知与不知的界限,以个人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其实是无知的表现。由于王倪“恶能知”,故有了啮缺的最后一问,即圣人是否知利害。受话人王倪把表述的言语行为通过示现、夸张、对偶的积极修辞手法展示出来,说明圣人是超脱于利害



得失之上的。

其次，“万物齐一”的思想还体现在语用修辞意图中。啮缺连续提了三个问题，王倪都表示“吾恶乎知之”。然而，谈话并没有就此终止，因为发话人啮缺的目的不仅是提出问题，得到王倪“知”或“不知”的答案，而其言外之意是希望受话人对这些问题给予全面的阐述，在这里，发话人假定王倪是遵守合作原则的数量准则和质量准则的。在日常对话中，如果发话人遇到受话人不合作的反应很可能就终止了谈话。然而，在这里，发话人面对受话人同样的回答依然选择继续发问，显然这是作者庄子特意安排的，似乎是在故弄玄虚，然而，其真正意图是表达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怀疑，由此逐步引出受话人王倪对万物齐一的一番阐述。毋庸置疑，王倪是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他在说完“吾恶乎知之”后紧接着就说“尝试言之”，这是为了引发啮缺的思考。在接下来的回答过程中，王倪用了反问、排比、对偶、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强调是非对错没有统一的标准，其目的就是增加言辞的说服力，表面上是与啮缺进行互动，实则是为了唤起读者的思考，使读者对“万物齐一”的思想产生共鸣。

再次，从会话的语用修辞效果来看，与其说庄子忽略会话双方的感受，倒不如说通过会话让读者理解“万物齐一”的道理。受话人王倪通过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运用，通过间接的言语行为回答了发话人啮缺的问题，提出了世间万物本没有差别，也无必要去区分是非彼此的观点。但从发话人啮缺的反应来看，他并未理解王倪的言外之意，从而导致对“子知物之所同是乎？”问题的进一步发问，迫使王倪对圣人的思想境界做进一步描述。对发话人啮缺来说，虽然未能达到最终的语用修辞效果，但是对《庄子》的读者来说，该会话语用修辞效果是不言而喻的。庄子通过会话意欲让读者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道”是万物的主宰，万物是平等的，是非是相对的。

## 6.2 “逍遥而游”的思想

《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历来被学者们所推崇和重视。本篇的主旨是表达庄子追求自在逍遥、无所待的绝对精神自由，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境界。只有不计社会功名利禄，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使心不为外物所累，摆脱主观意识上的束缚，才能得以真正的逍遥。因此，庄子在文中采用了多个寓言故事，如鲲之变化、海运鹏徙、蜩鸠讥笑、尧让天下于许由、藐姑射山之神人。庄子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请看“尧让天下于许由”中的一段对话：

例(2):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日出矣,而燔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鸛鷓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译文: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月亮出来了,而小火把还不熄灭,对于增加光亮,不是很难的吗?及时雨降下了,还要灌溉田地,对于增加润泽,不是徒劳吗?先生一立为天子,天下就可安定了,而我还徒居其位,我自己觉得很不安,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

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安定了,而我再接替你,我不是为虚名吗?名,是从‘实’派生出来的宾位,难道我为着这个‘宾位’吗?鸛鷓在深林中筑巢,只要一根树枝;偃鼠饮河水,不过喝满一肚子罢了。请你回去吧,天下对于我有什么用!即使厨师不下厨烹煮,主祭的人也不应该超越权限而代行厨师的职事。”

这段对话是在尧(历史上圣明的君主)和许由(远古道家时代的一个传说人物)间展开的,基本含义是尧想要把天下让给许由,但许由拒绝了他的请求。这则寓言故事中的许由是道家的代言人,圣人的化身,把他和一代君王做对比更能突出圣人不求功名利禄,不为外物所羁绊的自由逍遥。

从该对话的语用修辞行为看,发话人尧要把天下交给许由。他首先通过积极修辞的反问、对比和比喻手法实施了“陈述”(statement)与“疑问”(question)的间接言语行为,把日月之光和燔火做对比,把及时雨和灌溉水做对比,反问小大之间的巨大差距,传达了“请求”(requesting)的言外之力,说明了“请致天下”的必要性,启迪听者(或读者)去感悟和思考。然后,又通过消极修辞实施了“陈述”和“表达”的直接言语行为,阐述了让位的原因,指出了“夫子立而天下治”,自己不愿空居其位,最后运用了请求(requesting)的直接言语行为,点明了发话人尧的最终目的:“请致天下。”受话人许由强调自己不会为名利所动,首先他通过两个反问表明他不会为名所驱动,用“指令”(directives)和“阐述”(representatives)的言语行为间接表达了“拒绝”(refusing)这一言外之意,然后通过鸛鷓、偃鼠的比喻实施“阐述”(representatives)的言语行为,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志向只在“一枝”、“满腹”,而非“天下”。接着用消极修辞手段实施了“陈述”言语行为,婉拒了尧的请求,更加清晰明确了他的态度:“予无所用天下为”;最后用庖人和尸祝的比喻重申了自己的主张。

在该对话的语用修辞意图层面,发话人尧的目的是要说服许由接受天下,因为他认为自己占据君王之位是不合适的。既然他要让位于许由,那么就要考虑到对方的接受心理和身份立场,那么他就要做出语境顺应,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阐明自己的意图,便于听话人接受和理解。因此,尧用了委婉的表达方式来阐明自己的主张,即用陈述和疑问言语行为间接表达自己请求的言外之意,为了使听话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但为了使听话人更加清楚自己的真实目的,最后发话人尧总结了前述话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发话人尧运用先间接后直接的方式的语用修辞意图便是委婉而又清晰地向听话人许由发出请求。显然,听话人许由是庄子的化身,庄子是主张出世的,因此许由不可能接受尧的请求。在此许由的意图除了拒绝尧的请求外,还代表庄子发言,即不为“功”所累,不追逐外物,去掉功名利禄之心,做到神人无功。

不难看出,尧的话语意图被许由识破,从言外之意的语用功能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交际。然而,从许由的回答来看,他并没有接受尧的请求,从言后行为的修辞效果来看,其会话交际是不成功的,即语用修辞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庄子安排这段对话的主要目的在于突出许由这个圣人的道德修养和境界,因为庄子将许由视为道家学说的代言人,庄子要借许由之口表明其“无己”、“无功”、“无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上的“逍遥自由”。

### 6.3 “自然无为”的思想

主张“无为”可以说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顺物自然,无为而治”贯穿于《庄子》始终。庄子自然无为的思想使得他摆脱世俗的束缚,达到逍遥而游的精神境界。无为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顺乎天理,安时处顺,自然无为,体味自然之真之美。其中,《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故事很具有代表性。

例(3):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軼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

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嘻,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译文:庖丁为文惠君宰牛,手触肩顶、足踩膝抵等各种动作,牛的骨肉分离所发出的砉砉响声,还有进刀解牛时哗啦啦的声音,都无不符合音乐的节奏,与《桑林》舞的节拍,《经首》曲的韵律相和谐。

文惠君说:“啊,妙极了!你的技术怎么会高超出到这个地步?”

庖丁放下屠刀回答说:“我所爱好的是道,已经超出了技术的范围。开始我宰牛时,见到的都是整体的牛,三年之后,就再也看不见整头牛了。现在,我宰牛时全凭心领神会,而不需要用眼睛看。视觉的作用停止了,而心神还在运行。按照牛的生理结构,把刀劈进筋骨相连的大缝隙,再在骨节的空隙处引刀而入。因为完全依照牛体的本来结构用刀,即便是经络相连、筋骨交错的地方都不会碰到,何况那大骨头呢!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割;一般的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力砍。我的刀用到如今已经十九年了,宰过的牛也有几千头,可是刀刃还像刚开刃的时候一样完好无缺。牛的骨节间有缝隙,刀刃却薄得没有厚度,用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缝隙的骨节,宽宽绰绰,刀刃的活动肯定有足够的余地。所以这把刀用了十九年还像刚开刃时一样。虽然如此,每碰到筋骨盘结的地方,我看到它也很难下手,依然惶惧警惕,目光盯住此处,动作放慢。动刀虽然很轻,整头牛却哗啦一声立刻解体了,就像泥土被倾倒在地上一一般。我提刀站起,环顾四周,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然后把刀擦干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这番话,懂得养生的道理了。”

这段对话是在庖丁和文惠君间展开的,表面谈解牛之技艺,实际则谈论养生的问题。发话人文惠君赞扬庖丁高超的技艺并询问其中之原因。文惠君的语用修辞行为首先体现在叹词的运用上,他先用了一个叹词“嘻”,然后用了简短的感叹句式“善哉”来肯定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紧接着便通过消极修辞手法实施“疑问”的言语行为引起受话人的注意和兴趣。受话人庖丁总结了他如此这般解牛的原因,并详细地解释了解牛的全过程,连用了“依、批、导、因、更、折、解、入、游、至于、见、戒、止、提、立、顾、善、藏”等18个动词,澄清了文惠君的疑问。其中,他通过比喻、对比、对偶等修辞手法实施了“阐述”的言语行为,解释了他解牛的奥妙所在,说明自己所凭借的已不是“技”,而是“道”。最后文惠君用了感叹句式“嘻,善哉!”与开头相呼应,再次肯定庖丁解牛之道,阐明他真正的收获是了解了“养生之道”之真

谛。解牛和养生看似毫无关联，在这里文惠君却将两者联系起来，正是通过这一违反关联准则（relation maxim）的语用修辞行为使听话人推导出真正的言外之意：即养生恰如解牛一般，要顺乎自然。

从庖丁与文惠君的对话中不难看出，作为发话人，文惠君表面上是在询问庖丁为何他解牛的技术如此高超，实际上是询问如何养生，其语用修辞意图是引出庖丁对解牛过程的详细阐述，并在解牛所遵循的“道”之中寻求与养生的相关之处。庖丁作为听话人表面是在回答文惠君解牛的问题，而其会话含义是要告诉他一个道理，即万物不能违背其规律；其修辞意图是要做到自然无为，“因其固然，依乎天理”，使精神不被外物所伤害，才能保全自己，这也是养生的内在含义。

从双方交流的修辞结果来看，庖丁在理解了文惠君会话含义的基础上，由解牛上升到养生；发话人文惠君在理解听话人庖丁的言外之意后，所得到的不是解牛之道而是养生之道，与文惠君达到了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听话人庖丁作为庄子的代言人详尽阐明了养生之道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自然无为。由此可以看出，发话人的话语意图得以实现，并且听话人都按照他的交际意图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因此这是一次成功的修辞活动，并取得了理想的语用修辞效果。

## 7 结语

语用修辞注重研究言语交际的全过程，听话人准确理解了发话人的话语意图就达到了行事行为之目的，如果听话人按照此意图做出发话人预期的反应，则实现了修辞接受效果，只有两者同时满足时才能保证达到理想的语用修辞效果。然而文本中的话语语用修辞的成功与否并非仅取决于文本内发话人和听话人的反应，而更多关乎于文本之外的听读者是否解读了说写者的真正意图。《庄子》话语文本其实是作者和读者间的交流，所有言说策略和技巧都是为作者恰当地传递话语意图、读者正确地理解作者用意而服务的。庄子会话语篇的交际双方都是为传递一定的哲学思想而特意安排的，把修辞当作一种言语行为来分析可以更加系统地探究其话语含义，从而解读那些隐藏在这些言语行为背后的哲学思想。本文把语用学、修辞学与哲学相结合，可以从一个新视角解读《庄子》话语意义，通过分析《庄子》话语中的语言特色和技巧来解读其深邃的道家思想。尽管这一理论方法还不十分完善，但作为一种学术探索可以为《庄子》话语语用修辞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 参考文献

- Hauser, G. 1986.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James, L. B. & W. Coleman. 1989. *The Rhetoric of Western Thought*. America: Kendall/Hunt Publishing Company.
-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 戴仲平, 2007, 语用学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比较及其合作前景, 《广州大学学报》(2): 62—67。
- 陈启庆, 2010, 《〈庄子〉修辞研究》, 吉林: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陈望道, 2005, 《修辞学发凡》,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何自然, 2000, 语用学对修辞研究的启示, 《暨南学报》(2): 38—44。
- 胡范铸, 2003, 从“修辞技巧”到“言语行为”——试论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修辞学习》(1): 2—5。
- 李军, 2005, 《语用修辞探索》,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 黎运汉, 2002, 汉语语用修辞学建立的背景,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 94—97。
- 林大津、毛浩然, 2006, 不是同根生, 聚合皆因缘——谈修辞学与语用学的区别与联系,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34—39。
- 刘大为, 2003, 言语学, 修辞学还是语用学? 《修辞学习》(3): 1—5。
- 刘焕辉, 1989, 从修辞学到言语交际学, 《江西大学学报》(3): 28—36。
- 马睿颖、林大津, 2008, 从表达效果到交际效果: 现代汉语修辞观的语用学转向,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 66—72。
- 孙通海, 2007, 《庄子》, 北京: 中华书局。
- 谭学纯、唐跃、朱玲, 1992, 《接受修辞学》,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王希杰, 1993, 《修辞学新论》,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张大毛, 2008, 浅析语用学中修辞学的应用,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 11—13。
- 张会森, 2000, 修辞学与语用学, 《修辞学习》(4): 24—25。
- 张志公, 1985, 《现代汉语》,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